

王守仁与明代书院的复兴

张羽琼

明朝开国后,自洪武至正德130多年间,明代的书院一直沉寂不振。自宋代以来久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经元末丧乱,年久失修,一直到明英宗正统年间,仍空无学生。^[1]至于其他的书院,也是名存实亡,只是作为祭祀先儒的场所。据载:“明初教士,一归学校,讲学书院之风一变,其存者徒以崇祀儒先耳。至正德而渐盛,嘉、隆、万历,所建尤多。”^[2]明代中叶书院由衰而兴,因素诸多,而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王守仁等理学大师的讲学活动促进了明代后期学术文化书院的繁荣。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别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守仁出身官僚家庭,少年时即立志读书学圣贤,28岁中进士,34岁时开始讲授儒家学说,曾与湛若水定交,以倡明圣学为终身志愿。正德三年,因触犯当朝权宦刘瑾,贬谪贵州龙场驿做驿丞。刘瑾死后,王守仁官复原职,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官至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兼江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两广总督兼巡抚。王守仁作为明朝的重要官员,但一生从未放弃过教育活动。

王守仁从34岁时开始聚徒讲学,此后即使从政也不忘教育。追寻踪迹所至,他谪居龙场,创办龙冈书院,后又主讲贵阳书院;在江西创办社学,修建濂溪书院聚众讲学,又集门人讲学于白鹿洞书院;总督两广军务时,创办思田学校、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致仕后,先辟稽山书院,后办阳明书院,又讲学于余姚龙泉山寺,等等。王守仁的办学和讲学活动,直接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复兴。史载:“王新建(王守仁被封为新建伯、故称之)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继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顿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3]“正、嘉之际,王守仁聚徒于军旅之中,徐价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4]这些均说明了王守仁讲学活动的巨大影响。

王守仁之所以积极从事办学和讲学活动,是同他不满当时的教育风气,以及迫切要求发展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术思想紧密相联的。理学自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创始之后,陆九渊和朱熹继承周、程而发展成为两大派别。南宋末年以來,程朱理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经元至明代的发展,程朱理学倍受尊崇,朱注《四书》被定为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及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并日益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僵死教条和空泛说教。王守仁早年曾从事宋儒格物之学对朱熹著作颇下过一番功夫。后来对程朱理学产生怀疑,对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的功夫产生动摇。他逐渐认识到程朱之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结果是造成“记诵辞章”的恶习,使人“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饬以伪,……而圣人之学遂废。”他认为“若求圣人之道,惟在心中自得。”^[5]他批评当时的官学教育空疏腐朽:“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之所学,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6]并抨击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认为“记诵广,适以长其傲心;知识多,适以行其恶;闻见博,适以肆其辩;辞章富,适以伤其伪。”^[7]王守仁反对朱熹所说的为学之道

在“即物穷理”，提出“致知格物”不能“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而只能求理于吾之心。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世之学者不知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8]王守仁用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来阐述自己的教育观点，认为“理”就是“心”，“心”就是“理”，“心”就是世界，“心”无所不包。所以单读书还不行，必须考之于心。学习的目的是去人欲、存天理，而不得其方才要读书，因此心学是根本，读书是工具和方法。王守仁极力推崇陆九渊的“心学”，认为“圣人之学，心学也”。陆氏之学“简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传”。^[9]

王守仁认为要端正教育风气，必须求理于心中，因为“理”在“心”、“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所以他说“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10]既然如此，那么教育的作用就是“不假外求”，只有“求理于吾心”才是“圣门知行合一之教”。^[11]王守仁发挥孟子的良知说，把人心中的“天理”叫做“良知”，“良知”是人与生俱来，“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12]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使人“致此良知”，并说“致良知之外，无学”。^[13]就这样，通过批判程朱之学，王守仁建立了“阳明心学”的思想体系，在讲学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观点。

在王守仁生活的时代，科举和官学均以程朱理学为宗，王守仁要想摆脱程朱理学的束缚，“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14]必须另辟讲学之所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和学说。事实上，王守仁心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份“心即理”说，“知行合一”说，“致良知”说都是在书院的讲学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他在龙冈书院和贵阳书院讲学时，已发明“良知”之旨，提出了“知行合一”之说；他在江西濂溪书院讲学时，专讲“存天理，去人欲”的克制省察的工夫；他在稽山书院和敷文书院讲学时，就把自己的学说集中概括为“致良知”之说。王守仁宣传他的学说，推动了明代中期书院的复兴，而书院的复兴又为王守仁思想、学说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阵地。钱德洪曾说王守仁学有三变、教亦有三变。学的三变是初学辞章，并遍读朱熹的书，次出入于佛老，三在龙场驿居夷处困悟出圣人之道悟性自足，不假外求。教的三变是在贵阳初以“知行合一”之说教人，次在离滁阳之后以静坐教人，三在江右以后以“致良知”教人。^[15]可见王守仁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是在其教育活动中完成的。

由于王守仁的积极讲学，使“阳明心学”“门徒遍天下，流传愈百年”。王守仁死后，王门弟子纷纷建立书院，一面奉祀其师，一面传授王学。嘉靖九年，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并在山麓筑王守仁祠，“每年祭期，以春秋仲月仲丁日，四方同志如期陈仪礼，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日。”^[16]沈谧一直仰慕王学，听说薛侃在京师讲学，十分感动说“师虽歿，天下传其道者，当有人也。”^[17]遂率同志数十人前去拜见听讲。嘉靖十九年，周桐和应典在永康的寿岩建书院，与同门李珙、程文德讲明师旨，从业者百有余人，岁时奉祀，定期讲会。“王门弟子”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间，故明代书院在嘉靖年间创建最多。主要有越城的阳明书院、安福的复古书院、青田的混元书院、辰州的嘉义书院、宣城的志学书院、万安的云兴书院、韶州的明经书院、泾县的水西书院、广德的复初书院、蕲州的学正书院等。黄宗羲曾把王门弟子按籍贯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北门王门和粤闽王门。明代中期这些地区创建的书院均超过前代，应该说是王门弟子的功劳。

在王守仁及其弟子的积极推动下，明代书院讲学之风大盛。王守仁著名的弟子钱德洪、王畿等在全国周游讲学，连续三四十载不辍。再传弟子极多，且遍及社会各阶层，这些人大办书院，大开讲会。如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阳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

复初会等等,使南宋书院的讲会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徐阶继严嵩为相后大办书院,大开讲会,使得各级官吏争立书院以逢迎。史称:“嘉靖末年,徐华亭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我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18]无论官吏们办书院的主观愿望怎样,而客观上为明代书院的振兴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泰州王艮、王东崖父子俩不仅创办淮南书院,而且还往来各郡,接近社会下层,学生有农夫、樵夫、陶匠。王艮用“百姓民生日用为道”开讲,樵夫朱恕每樵罢必到王艮堂阶下听讲,颇有所得。陶匠韩贞慕朱樵而从之学,后又卒业于东崖门下,粗识文字。“(韩贞)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19]王门弟子的这些活动不仅把书院扩展成了地区性的学术活动中心,而且进一步扩大了书院的讲学范围进而风及全社会。

王守仁一生的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于一方面“破山中贼”,另一方面“破心中贼”。前者的意思是指他直接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后者是指宣传他的“心学”思想,从事教育活动。他曾作有一首《睡起偶成》说:“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他自信通过教育活动,用“救世救民”的钟声,把懵懵昏睡的人们唤起。王守仁文武两方面的“事功”,都曾得当时和后世一些士大夫的推许。然而两相比较,王守仁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影响更为深远。

王守仁的教育活动和“心学”宣传,直接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复兴,这是王守仁及其弟子们的一大功绩,应当肯定。

[1]王祿:《游鹿洞记》,载《白鹿洞志·卷十二》。

[2]柳诒征:《江苏书院志初稿》。

[3]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四。

[4]《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九》。

[5]《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别湛甘泉序》。

[6][7]《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传习录·上》。

[8]《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稽山书院尊经阁记》。

[9]《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与席元山》。

[10]《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紫阳书院集序》。

[11]《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12]《王文成公全书》卷八《书朱守乾卷》。

[13]《王文成公全书》卷八《书魏师孟卷》。

[14]《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答徐成之》。

[15]钱德洪:《阳明先生文集序》。

[16][17]《王文成公年谱》。

[18]沈德符《野获编》。

[19]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作者单位 贵州师大历史系(550001)

责任编辑 张祥光